



陶行知
(1891—1946)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陕西省陶行知研究会(筹备组)

1985·3

录

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1
毛泽东同志题词·····	2
朱德同志题词·····	2
中共中央代表团唁电·····	2
宋庆龄同志题词·····	3
董必武：哭陶行知·····	3
陶行知是最早注意乡村运动的人·····	3
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4
延安新教育学会给陶行知的慰问信·····	6
延安新教育学会举行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庆祝大会·····	6
再论我们的学习·····徐特立	7
纪念陶行知先生九十诞辰大会开幕词·····邓颖超	8
纪念陶行知同志 大力普及教育·····胡愈之	9
论陶行知教育思想·····刘季平	13
陶行知大事年表·····	18
陶行知生平事略·····陶晓光	21

陶行知先生著作选登

我们的信条·····	23
中国农村教育之根本改造·····	24
行是知之始·····	25
教学做合一·····	26
以教人者教己·····	27
在劳力上劳心·····	28
生活即教育·····	29
教育的新生·····	33

生活教育之特质·····	35
中国普及教育方案探讨·····	37
育才学校创办旨趣·····	43
创造宣言·····	45
社会大学运动·····	47
思想的母亲·····	48

研究陶行知思想的主要书刊介绍

北京市陶行知研究会成立大会辑录

学习陶行知 研究陶行知·····	张劲夫	51
略谈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新局面·····	刘季平	54
中国“将米一定了不得”——北京市陶行知研究会成立记·····	郭以实	57
中央和北京市各报社、通讯社、电台发布的通讯、贺电、贺信、贺词·····		59
北京市陶行知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名单·····		69
社会大学的历程简介·····	周西平	70

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周恩来同志向陶行知先生遗体告别后

当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一、我及小超等今日下午飞回南京。

二、在离沪前，陶行知于今晨忽得脑出血，我们赶到时已断气，痛心至极，惟握手时，体温气色未动。据沈钧儒子（系医生）云，确系脑出血，尚无其他中毒症候。为慎重计，我们已商定将尸体在殡仪馆放过十二时，看有无变化，然后入殓。

三、如无其他原因，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我这次去沪，曾意识到陶先生的安全，提出要上海工委劝他休养一时期。话未传到人已不在。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

四、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已告上海潘汉年及伍云甫，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

五、请中央将南京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

六、我今日弄清情况，明日再见马歇尔及司徒雷登。

1946年7月25日（原载《人物》丛刊1980年第四辑）

痛悼伟大的人民教
育家
陶行知先生千古

毛泽东

吾曾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
为大众服务，不屈不挠的
为独立和平民主斗争
的精神

朱德

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为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一日延安各界代表二千余人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所题的悼词。（原载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一日延安《解放日报》）

中共中央代表团唁电

伟大人民教育家和民主战友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实为中国人民大众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最大损失。相信陶先生之死，将振奋无数崇仰先生思想事业人格作风之男女，更加坚强起来，为人民大众服务，特电致唁，并希节哀。

周恩来 董必武 邓颖超 李维汉 廖承志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哭陶行知

董必武

敬爱陶夫子，
当今一圣人。
方圆中规矩，
教育愈陶钧。
栋折吾将压，
山颓道未申。
此生安仰止，
无复可归仁。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六日

新华日报发表

行知先生千古

萬世師表

宋慶齡



陶行知是最早注意乡村运动的人

“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

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

摘自《周恩来选集》上卷 333 页《学习毛泽东》一文

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 在延安陶行知先生追悼会上的悼词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一日)

我今天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来追悼陶行知先生。中共中央,对于陶行知先生之死,异常悲痛,认为这是中国独立和平民主运动的重大损失,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大损失。因为陶先生一生致力于救国事业、民主事业与教育事业,他在教育方面对人民的贡献尤为巨大与不可磨灭,陶先生之死,对于中国民主运动与新教育运动是不可补偿的损失。

我们追悼的陶行知先生,是人民的教育家。在人民中进行教育,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目的,一种是蒙蔽人民,要人民甘心做反动派的奴隶,做帝国主义的顺民,服从命运或英雄的摆布。抱着这种目的的教育,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决不是为人民的教育,而只能是奴隶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决计没有前途的,因为如果中国人民不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教育事业就没有发展的前途,只有衰落的前途。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是有另外一种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他把人民看作人,而不是看作奴隶和顺民,他主张人民的解放。他又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所以他相信人民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在教育事业上,他同样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这种思想,充满在他的著作之中。他主张人民自己为自己办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他为了这个主张,孜孜不倦,干了一生。谁见过陶先生的,就被他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所感动。陶行知的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以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为目的的教育,是有极其宽广的发展前途的。这种教育,在国民党统治下,受尽了压迫,受尽了灾难,不能得到宽广的发展。这是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乃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统治着的中国,陶先生和他的事业在那里受到磨难,这种磨难乃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所受到的苦难的缩影。但是,这种磨难将是暂时的。在人民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解放区,陶先生的思想得到广大的欢迎,他的理想被实现,被发扬光大。在将来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一定如此。所以,这种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教育,才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才是为人民自己的教育,才有光明的宽广的发展前途。

要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教育家是不能不问政治的,而且不能不在政治上坚决站在人民的方面,作坚强的奋斗。这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这两座大山,重重的压在中国人民身上。为人民的教育事业,也被这些反动势力压得不能发展。陶先生从九一八后参加救国会起,他的政治立场就很鲜明了。在政治上,他与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主运动中的亲密战友。陶先生所以如此并不是偶然的,他是从他的多年实际经验中,深切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是

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坚，了解了共产党的大公无私，共产党的主张正确，共产党在为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奋斗时坚强不屈，所以不怕一切诬蔑压迫，与共产党携手奋斗。陶行知先生，在他的政治生活中，他的主张，他的行动，他的作风，他的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他的刻苦耐劳，坚强不屈，视死如归，都是人民的模范，不仅仅别人应该把它们当作模范来学习，我们二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也要把它们当作模范来学习。陶先生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正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象鲁迅先生、邹韬奋先生等所走的同样的道路。

现在，陶先生死了。他的死，是在为独立、为和平、民主的奋斗中劳苦过度而死的。死的以前，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等先生，并且准备了黑名单要暗杀上海许多民主人士，国民党特务曾到陶先生寓所打听陶先生的行迹，显然是想害于他。陶先生知身处险境，一夜整理诗稿十万字，以便可以无所牵挂与敌人战斗，这里表现了陶先生为了人民解放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可是，因为过分劳苦，次日即突患脑出血逝世。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解放区的教育界，要继承陶先生的遗志奋斗！我们要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之下，团结得紧紧的，来争取独立和平民主，争取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实现。我们解放区的教育界，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和陶行知先生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原理，并把它实现，唤起解放区人民，更加积极的参加解放区的建设和自卫战争。

陶行知先生精神不死！

（摘抄于《陶行知教育文选》）

（上接第22页）

是最早关心农民问题而又深入农村躬行实践的人，是知识分子最早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先驱之一。他教育师生“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的名字由“知行”颠倒为“行知”，进而创造了“衡”（行知行）的签名，标志他从笃信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唯心论，转变为确信辩证唯物论。他自己的一生，正是不断追求真理做人的典范。他学识渊博，勇于实践，善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他各个时期的革命教育工作，百折不挠“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在教育理论及其实践经验方面，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才华横溢，善于用工农大众易懂的诗歌形式和语言，抒发劳动人民的心声，表达自己的思想，世称大众诗人。陶行知一生的思想与实践，为我们留下了一座丰富的“矿藏”，有待今人去开发利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祖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

陶晓光等供稿

1983. 7. 1

延安新教育学会给陶行知的慰问信

正副会长 徐特立 范文澜

“先生从事教育事业以来，就打起反老八股的旗帜，向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进攻，创立生活教育理论，主张教学做合一，注重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力图打破劳心与劳力的分裂。象先生这种进步的教育主张，正是对症下药，为治疗中国教育弊病的良方；而先生献身教育事业不辞艰苦，不怕困难的精神，更足以称为教育界的模范。

“先生的教育主张及十五年来所辛苦经营的事业，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占了光辉的一页。这不仅是对摧毁中国传统教育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教育树立了一块基石。我们恳切的希望先生和生活教育社诸先生，本着晓庄精神，本着生活教育精神，团结全国教育界人士，为中国新教育而进一步努力。

“本会成立的宗旨，即在团结全国教育界人士，以谋新中国教育理论与实际的建设，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完成，……。目前本会同仁正在研究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并决定编印先生的教育论文选集，以资宣扬生活教育的进步主张。”

（摘自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3月19日）

延安新教育学会举行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庆祝会

三月十七日延安新教育学会举行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庆祝会，会上罗迈同志指出：“陶行知先生和徐特立同志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两面大旗，我们研究生活教育时，应按照它发展的历史顺序并把握它的基本精神，而不应咬文嚼字，断章取义。陶先生不仅继承了“五四”文化革命的民主、科学、反老八股精神，而且进一步发展为反对洋八股。这是我们今天反对教条主义、党八股、整顿三风时刻要特别学习的。”

（摘自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3月19日）

再论我们的学习

徐特立

徐老在文章上又一次指出：

陶行知的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改正错误的思想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陶行知是中国的教育家，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大部分人只知道他发明了教学做合一，发明小先生制，而不知道他是极端反对主观主义的模范。因为他不自满，才能发现儿童的天才，发现儿童是成人的先生。陶行知原名知行，一旦发现了自己的根本错误，即发现了把知放在第一位，把行放在第二位的错误，立即把自己名字倒转过来，亦即把自己一生行为倒转起来，否定自己，反对自己。这种精神，请我们同志自己检查一下，何时有过？陶行知不是马列主义者，不是布尔什维克（后来，周恩来同志说陶行知是党外布尔什维克……编者注），是救国会负责人之一。同志们，我们各人检查一下，是否值得我们向救国会各个先生们学习呢？陶行知的先生是杜威，我们的先生是马恩列斯。杜威以下产生了陶行知，杜威给陶以小本钱，陶竟成了一个富翁大贾。马恩列斯给了我们许多财富，我们还不能很好的使用，还产生了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尤其是把他们的唯物辩证法变成了新旧约、可兰经及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是只有一句最主要的没有读。即费尔巴哈上说的“一切东西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我们有些同志把自己当做神圣看，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陶行知先生创造了教学做合一，尤其是反对了普及教育的教条主义，发明小先生制。……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我在江西所行的小先生制密合，但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理论，他实际比我高明。我不是他的学生，我常尊敬他为师，我与故旧通讯，暑假名常署“师陶”。

（摘录于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

注：1942年2月12日徐老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我们怎样学习》。

行知先生遗教：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立脚点要平等，

出头处要自由。

紀念陶行知先生九十誕辰 大會開幕詞

鄧穎超

今天是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著名的人民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我们大家在这里集会隆重纪念他，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陶行知先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典范。二十年代前后，他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内，他从事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和普及教育运动，谋求通过教育途径救国。“九·一八”事变以后，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眼见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招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极为愤慨；同时又听到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非常拥护，并开始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他就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而奋斗。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为争取和平、民主而英勇斗争，直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与此同时，陶行知先生就把他从事的教育活动，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抗日战争之前，他从事国难教育运动，配合抗日战争，提出开展抗战教育运动，抗战胜利后，配合民主斗争，提出开展民主教育运动，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四六年，他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猝然病逝。时年仅五十五岁。毛泽东同志亲笔题了悼词，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同志称他“十年来，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正确的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先生一生光明磊落。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亲密战友。他后十年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到死。他不避艰难险阻，不顾敌人威胁利诱、不计个人得失安危，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教育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我们开会纪念他，就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心同德，为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八日

纪念陶行知同志 大力普及人民教育

胡 愈 之

今年是陶行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也是他逝世三十五周年。

他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民主革命家，爱国人士，中国人民救国会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大众诗人，革命战士，进步的思想家，而更重要的，正如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里所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他早年曾经受到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一九一四年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跟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孟禄研究教育。一九一七年回国以后任南京高等师范教授兼教务主任。主编“新教育杂志”和“新教育评论”。反对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改“教授法”为“教学法”。特别在“五·四”运动以后，他热心于科学、民主，首先重视乡村教育运动，在南京郊区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还办了中心小学八所，中心幼稚园四所，民众学校三所，以及中心茶园等事业。他脱掉西装革履，和师生一起生活、劳动，同甘共苦，和农民交朋友。

陶行知早年相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九二七年末曾写下了著名的《锄头舞歌》：“天生孙公做救星呀，唤醒锄头来革命呀”。晓庄学校开始除无党无派的师生外，还有国家主义派分子和国民党党员。一九二八年以后，又参加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成立了地下党、团支部，开展地下工作，同国家主义派、国民党作斗争。对这个问题，陶行知同志采取比较开明自由的办学方针，说晓庄是“自由园地”，允许各党各派存在。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允许共产党同其他党派并存，这在当时是大胆的进步的主张。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晓庄师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参加了支援南京下关和记洋行工人斗争和反对日本军舰停泊下关的游行示威。陶行知同志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保护革命青年。蒋介石下令于十二日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同志遭到通缉，被迫避居日本。

一九三一年春，陶行知同志回到上海。他鉴于日本工业的发展和科学发达关系很大。得到《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的帮助，创办了“自然学园”。他组织编写《儿童科学丛书》，随后又创办了儿童通讯学校（函授学校），开展“科学下嫁”运动即科学大众化运动。同时，着手发动普及教育运动。一九三二年在上海郊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主要招收农民子弟，实行边工边读，并在农村儿童和群众教育中推行小先生制。

在此期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员协助陶行知工作，并先后派人到工学团开展工作。陶行知同志依靠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合作共事。以后又组织普及教育助成会，在上海市区组织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并在工厂区办工人夜校，识字班，在工人、劳苦群众和贫苦儿童中推行普及教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这时他已经进一步认识到工人群众的重要，写下了《新锄头歌》：“光棍的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在普及教育运动中提出了为工农群众的方向。一九三四年，他创办了《生活教育》半月刊。

陶行知同志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在“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以后，逐渐

发生了变化。他目睹蒋介石对外屈膝妥协，对内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曾连续发表了大量政论性文章，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另一方面他看到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特别是在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受到影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才是中国希望所在。他把他的生活教育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协助下，他组织国难教育社，开展国难教育运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终于从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他开始反对胡适之流鼓吹杜威资产阶级教育的主张，坚决拥护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他和沈钧儒、邹韬奋、马相伯等发起组织救国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一·二八”抗战四周年纪念，他与沈钧儒带领近万人的群众游行示威，徒步四十五里。以后经常参加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发表演说。这年七月又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张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战的政权。毛泽东同志曾写了回信，赞同他们的主张。十一月，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救国会“七君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当时陶行知同志在国外访问，但又一次遭到通缉。

陶行知同志于一九三六年七月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他还受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开展广泛的国民外交活动。先后周游亚、非、欧、美二十八国，参加了很多国际人民团体的会议，开展对侨胞和世界人民的广泛访问、讲演、募捐等活动，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主张，争取世界人民支持，动员广大侨胞为抗日贡献力量。他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抗日救亡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陶行知同志在伦敦时曾谒马克思墓，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注），小坟葬伟人”，表达了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敬仰。

一九三八年夏，陶行知同志回到香港。十月回到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蒋介石曾拉他参加国民党，并请他担任三青团的高级职务，他加以拒绝。在国民参政会上，他提出推行普及抗战建国教育方案，决议通过后被国民党搁置一边。国民党威胁他说，你的学生和朋友中，很多是共产党。他回答说：“他们是否共产党我不知道，但就是共产党，他们办事认真，又有能力，一心为抗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以后他经常受到特务的监视。但是陶行知同志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不怕威胁、迫害而战斗不止。他始终拥护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在参政会内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抗战期间，陶行知同志提倡战时教育运动。他指出“要有全面的教育来配合以促成全面抗战”，“以争取最后之全面胜利”，主张“抗战建国的生活与抗战建国的教育结为一体”。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正在成立，他被选为理事长。在香港创办了中华业余补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同时他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教育只是民族大众解放之工具”，提出教育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争取抗战胜利，并创办了《战时教育》杂志。

一九三九年七月，陶行知同志于重庆筹办育才学校，从难童中挑选有特殊才能的入学，实现他的宿愿：“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成长为为人民、为国家

注：“二四七四八”是马克思的墓号。

民族贡献所能的人才和战士。育才学校是在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支持下诞生的，并得到进步人士的支持，它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建立了地下共产党支部，学校负责人和教职工大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的专家、青年，与他亲密共事，并肩战斗，大批在重庆的进步学者、专家先后来校讲课。它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所进步的、革命的学校。招收的学生除难童外，以后又有一些革命干部、进步人士的子女入校。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它以各种方式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坚持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师生参加生产劳动，重视接近工农群众，并开展学校附近的群众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和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重视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学习生动活泼，思想活跃。

国民党反动派一直用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等手段企图扼杀育才学校。一九四一年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育才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一批师生离校转移到解放区。陶行知同志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打破国民党派人控制学校的阴谋。在国民党统治区物价疯狂上涨的情况下，他到处奔走征募捐款维持师生生活，他节衣缩食，把募捐到的款项全部用于维持育才学校，自己却常在重庆街头买两碗“小面”充饥，和师生一起艰苦奋斗。育才学校还学习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生产自救。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许多同志都先后到育才看望过、作过报告，对育才师生和陶行知同志十分关怀。陶行知同志和南方局的同志经常来往。每遇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时，不顾特务的监视，常于夜雾茫茫中前往曾家岩、红岩村找周恩来、董必武同志谈心。他曾对人说：“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他曾写诗赞《新华日报》说：“自己每天必读，随时还教别人。”他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曾高兴地说：“中国有救了！”他向往解放区，在为几位奔赴解放区的同志送行的时候说：“你们到了光明区，加紧努力！我只要还有一丝留在重庆的可能，我都要在这里奋斗！”

一九四四年，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下，国民党军队在湘桂大溃退时，一溃千里，大后方人心惶惶。育才学校根据党的方针，准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并深入周围农村发动群众。在重庆街头演出延安秧歌舞，唱民主歌曲，并编出反映政治形势，发出就地抗战呼声的话剧在重庆演出，轰动一时，鼓舞了群众。育才师生一批批先后走出学校，有的投奔解放区，有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同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以更大的革命热忱、以坚强的民主战士的姿态奋不顾身的投入反对内战，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并提出民主教育运动。《战时教育》改为《民主教育》，并创办了《民主星期刊》，他发表了许多文章、诗歌，为争取和平民主和民主教育而大声疾呼。他指出新旧民主的区别：“旧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作主，为少数人服务。新民主是人民大众作主，为人民大众服务”，“民主的教育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他说“民主教育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是教人发展民主，在反民主的时代或民主不够的时代，民主教育的任务是教人争取民主。到了政治走上民主之路，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之创造计划，教人依着民主的原则，发挥个人及集体的创造力，以为全民造福”。以后又提倡社会大学运动，在地下党组织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与李公朴、史良等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这是一个团结进步青年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 and 专业教育的文科夜大学。

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他作为人民团体的代表，多次受到接见。他为政治协商会的成功而奔走呼号。在出席重庆市进步人士公祭昆明学生“一二·一”反内战运动死难烈士的追悼会前，他作了牺牲的准备，给生活教育社的同志写好了遗书。一九四六年一月在政协

会议期间，他和李公朴等组织民主促进会在沧白堂举办讲演会时，国民党特务殴打讲演者和会议参加者，他和育才师生保护中共代表。政协会议成功，重庆各界在较场口集会庆祝，他组织育才、社大师生担负宣传和纠察工作，并向大家说：“纸上的东西，还要我们用行动去争取才能实现，我今天去开会准备挨打，甚至流血的”，要大家也要作好思想准备。会上，国民党特务军警打伤郭沫若、李公朴，育才、社大师生也被打，他气愤地说：“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血、用生命去争取的。”

一九四六年四月陶行知同志到上海后，一面忙于育才迁沪等工作，一面即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在他生命最后的一百天中，发表讲演一百多次，有时一天连续讲三次。六月二十三日，他在欢送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的群众会上高呼：“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七月间，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害，白色恐怖弥漫上海。陶行知同志得知自己被特务列在黑名单上的第三名，朋友们劝他多加提防时，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在他给重庆育才师生的信中说：“如果消息属实，我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个来顶补，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他沉着冷静，坚持工作，整理诗稿，准备牺牲。七月二十五日，因劳累过度，不幸患脑溢血去世。

陶行知同志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献出了一生的心血。但是他的教育思想是逐步发展的，在晓庄时期他曾经说过他是在“摸黑路”。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从参加救国会开始，他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无保留地跟着共产党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以生命为代价，对中国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在他逝世时，周恩来同志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说：“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跟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这是对陶行知同志的盖棺定论。由于他去世得过早，在解放以后有些人把他的早期思想、认识，看作是始终不变的。甚至把他时常运用的武训行乞办学的故事，对他进行指桑骂槐的批评。主张文化专制主义的江青就是这样来向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进行恶毒的攻击的，因此在纪念陶行知同志的今日，重新研究和学习陶行知伟大的人民教育思想，肯定他在革命事业中所作的伟大贡献是十分必要的。

在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普及全国的人民教育，借以提高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使我国迅速走上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这也就是纪念陶行知同志的根本意义。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同志永垂不朽！

论陶行知教育思想

刘季平

在陶行知先生逝世三十七周年纪念会上，我曾检查了自己过去的左倾思想影响，并希望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学习并贯彻执行党中央有关教育方针、指示的基础上，注意研究和正确评价陶行知教育思想。

那次我说：作为比较早和陶行知先生发生师生关系和工作关系的共产党员之一来讲，我在长期保持和陶行知先生真诚相见、积极合作的基本态度方面，可以聊以自慰。对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平等待人、助人为乐、放下架子，赤脚下乡、无私无畏、破旧创新、身体力行、不断前进等等高尚品德，一直极为崇敬。可是，我过去先后给他扣过“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新马尔萨斯”等三顶帽子，说明我以往虽避免了某些过左行为，却仍存在左倾思想影响。

我也说了：现在我越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越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有关文件，越学《邓小平文选》，并重读陶行知的许多著作，就愈加认识到，我以前的好些想法，都应该认真加以改正。但是那次尚未讲清道理。现在想再进一步着重谈谈必须改正左倾看法的几个主要理由。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

我曾提起，我们不单不应给他扣上改良主义帽子，也不能仅仅说他是旧民主主义走到新民主主义，还应该看到，他是新民主主义愈益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要结合他的具体言行，好好分析一下他在教育方面的基本思想实质。

他的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早已由他自己归结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对此，他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曾作过多次讲解，越讲越明确了他所特别重视的要点。关于“社会”“生活”他在起初只着重谈“乡村农民”、“乡村教师”，讲求“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到后来就愈益强调了以“靠自己动手做工（种田）吃饭的真工人（真农人）”为主的我国“劳苦大众”，争取“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的“革命生活”。关于他视为教育中心的“做”，起初只泛指“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后来就特别着重了促使我国大众“觉悟、联合、解放”，“捣碎痛苦的地狱、创造人间的天堂”的“行动”。为此他一直都特别注意适应我们这个“穷国”要造成这样一个大变化的实际情况，要求多想穷办法、新办法，反对传统教育，超然教育，洋化教育。

他的教育思想的这些基本观点究竟说明了些什么？我觉得，这在实质上就是表明，他虽重视学校教育，但他的整个教育思想，是从我国整个社会着眼的而且无论是讲社会或学校的教育，都是以当代我国社会实践为依归的，特别是到了后期，更是以革命的社会实践为中心，来认识和处理教与学、教育与实践的关系的。如果我们能跳出只片面重视学校教育的狭小圈子，能打破只一味强调老一辈给下一代传授知识的旧教育思想，转而从广义的教育观点来看待教育，注意密切结合社会实践，根据当前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办教育，那就不单易于认清陶行知先生这一思想的主流，而且不能不承认，他这种教育思想的实质，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教育事业所理应坚持的主要原则是有共同之点的。

在这里，陶先生自己最重视的是“生活即教育”，我拟另文细加研究，目前想以社会与学校的关系为主，先做初步探讨、兼论其它几点。据我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以前，除宣传共产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旧教育外，只能要求“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并依靠部分进步教育工作者开展文化教育，不可能指望资产阶级教育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列宁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后不久，就明确指出了，“教师不能把自己限制在狭隘的教学活动的圈子里，教师应该和一切战斗着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新教育学的任务是要把教师的活动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联系起来”。并且十分重视社会教育，多次召开社会教育处长会议。一再强调“同宣传鼓动联系着”的“社会教育对于改造整个生活有重要意义，必须找出新的方法”。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已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顺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现阶段的历史任务是要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既有高度物质文明、又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我们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就决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必须密切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阶段的实践，十分重视实践教育、社会宣传教育，努力“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人民群众，抵制和克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封建残余思想和其它非无产阶级思想”，并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当然，实践教育、社会宣传教育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有些事要由党与政府统一抓，有些事要靠各地、各方面、各单位分工协作办，但教育部门不仅要直接负责或参与一部分工作，而且实践教育、社会宣传教育说到底也属于教育范畴，学校教育更不能孤立办学，因而就必须把它作为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统一研究。

我们当然不能不重视学校教育，我们要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办幼儿园，办中小学，为培养各类中高等专门人才办大学，办中专。可是我们所重视的学校教育，乃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新学校，决不是脱离社会，脱离革命实际、脱离生产劳动、片面偏重死知识的旧学校。而且根据毛泽东、邓小平等同志的多次有关指示，我们党从来都是十分重视实践教育，都强调要把解放军以至全中国办成大学校，都把实干中的学习看成更重要的学习；把在党与政府统一领导下，对革命实践能直接起更大促进作用的社会宣传教育，看成更为基本的革命武器之一。回顾我们已往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也可以看到，在革命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实践教育、社会宣传教育所担负的具体使命，都比学校教育更为广宽、繁重、深入、持久，因为它要管党政军民、工农商学、男女老少、十亿人口、思想政治、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且永无休止。远者不谈，只要正视一下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这方面的大量工作，及其为现阶段四化建设愈益做好准备的每一有力步骤，就可以证明，所以不管某些教育工作者如何